鳴放

钓鱼岛
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YIKUO
撤回方案
on.cc
明報
再見 大浪西灣
長沙灣政府合署
還我大浪西灣 保護自然遺產!
EpochTimes.com
要我哋收声!
我哋粤大声!
粤
美元
7.80元
7.82元
五區公投
漫畫版
拒絕蒙騙 撤回方案
外國人都撐
廣東話
香港人講廣東話
唔識聽就返鄉下
賊船起錨
香港功能組別為禍人間

鳴放

序

我們第四十二屆幹事會稱為「鳴」。「鳴」是指勇於對社會不同事務發表意見，從而促進香港大學同學對社會事務的關注。

鳴放行動最初聲稱要吸納大學生對社會種種不公的意見，務求改善政府施政。後來鳴放行動逐漸演變成打擊言論自由的政治行動。

本刊名為「鳴放」，是因為本刊是我們現屆幹事實現上莊夢想的代表作 。多名幹事會在餘下十數頁，論盡社會大小事務。我們會從一件時事出發，用多角度分析，最後以幹事個人身份作評論。我們希望能引領大家反思事件中不同的觀點，並且有自己的批判。

我一直相信人天生是有責任的。社科學生的責任便是利用自己所學的改變社會。希望大家可以抱著社科生一向有的，對於社會事務的熱血，感染身邊的人。從我們開始，改變香港，改變世界。

總編輯
曾安迪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外務秘書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

大學教育產業化一
教育政策＝經濟政策？ 02

指責人民幣偏低沒道理 04

從香港政治文化看本土政黨發展 06

從「撐廣州話」看中國公民
社會之蛻變及發展前景 08

反對郊野公園私有化
支持保育與發展平衡 10

保釣運動 12

給六四亡靈的和平獎 14

政府應如何調較樓價？ 15

世博一國際盛事還是國家盛事？ 18

大學教育產業化－
教育政策＝經濟政策？

學術秘書　劉子豐

教育產業的定義

甚麼是教育產業？是教育還是產業？兩者在政策焦點上能共存嗎？至少，在香港的情況，能並行嗎，應該把教育當作產業嗎？自 09 施政報告提出教育產業化後，這些問題就成了香港社會就教育的討論焦點。究竟教育產業指的是甚麼？澳門大學副校長何順文教授認為教育作為第三產業或服務業可分為兩大類：(1)私人團體擁有及營運(可再分為牟利或非牟利性質)；(2)政府、法定或自願團體擁有及營運(非牟利或公益性質)。在香港，不論基礎或大專教學均以後者為主，而基礎以及大專教育對香港生產總值皆十分重要。當中以大專教育尤為重要，扮演著政府發展教育產業的主力骨幹。教育本是一種產業，政府想把教育服務進一步「產業化」，就是將營運教育的經濟效益列為更高的考慮因素，由「公益事業」轉化為「企業私營」，解決學位分配及人力資源市場問題。

政府提出的教育產業化計畫

政府提出政策時指出，香港經濟發展策略中包括有四大傳統支柱產業(金融、旅遊、貿易物流、專業服務)，以及六大具發展潛力的優勢產業，當中包括教育。政府認為香港是地區教育樞紐，發展教育產業大有可為。因此，政府計畫將預留的兩幅土地供私人辦學團體競投開辦自資學位課程，也會提供貸款，協助其興建校舍和配置設施。教育產業化之舉除了直接的經濟效益外，也有「提升香港競爭力」、「善用非政府的社會資源」、「為本地學生提供更多修讀學位課程的機會」、促進香港國際化等益處，為一舉多得。

外國發展教育產業的例子

新政策推出以後，國外發展教育私營化的成功例子，即被視為香港新發展策略的比較指標。美國私立名牌大學如哈佛大學、耶魯大學，以及亞洲私立名校如早稻田、高麗、延世等，已是成立多年的優質學府，憑著各自的辦學理念，成功吸引國際學生及大量資金捐助，教學質素遠比公立名校為佳。故即使學費高昂，仍有大量海外學生報讀，競爭十分激烈。教學質素為他們成功最重要的資產，單在學術研究上投入的資金已遠超香港本地大學。其實，學費只是其收入來源的小數，哈佛、耶魯每年獲得數以十億計的社會捐款，兩校更擁有數百億美元規模的投資基金支持學校日常開支。科研經費更是大部分來自聯邦政府，若學院本身不以質素為先，資金根本不會投入。

香港大專教育情況

作為政府口中形容的地區教育樞紐，香港大學教育產業化主要面對兩個問題。第一，新辦私立學校的質素問題。在缺乏資金投放的前提下，加上少了政府資助，不論資源上或師資上也受一定限制，新辦院校的質素必然備受質疑。於是，院校只能收納本地成績稍遜的學生，對要求質素的海外及內地學生並不吸引。認受性自然不可與國際名牌大學同日而語；即使是資源供應上也可能遜於本土公立院校；更遑論有助推動教育產業國際化云云。

第二，教育發展過於商業化。國際的一流大學，都不會以商業為其目標。大學是培養人才、孕育思想和創造發明的機構。照香港當前的社會現實與條件，無論教育的社會普及或學術氛圍，都不算是一個讀書求學問的好地方。政府的「教育產業化」其實質只是教育市場化，一切以功利錢財收入為準則(而事實上更是無法有效收納資金，增加收入)，以致學術精神淪喪。唯一能做到的，大概是為超過 80%的失學青年增加入學機會。但同時基於教學質量所限，如此只會做成學位集體貶值，私立院校淪為學位生產機器的大弊。

作為學生的立場

甚麼是教育產業？是教育還是產業？作為香港大學的學生，這問題可以算是最切身的社會議題了。我認為，教育的目標應重於知識本身的價值以及對學生啟發的價值；教育作為產業，應是副產品，而絕對不如政府所提出的優勢產業「發展項目」。故此，我不贊同香港教育產業化方案，新設私立大學沒法吸引外國學生來港留學，僅為本地生提供缺乏認受性的學位，淪為經營本地生學歷文憑生產的商業機構。同時，我亦肯定教育產業發展對教育本身並城市國際化的正面影響一政府應以資助科研為方向，提高院校市場吸引力，確保教學質素，方能真正把私立大學國際化，也為本地學生提高教育質素，高等教育不致貶值。

指責人民幣偏低沒道理

時事秘書　鄒偉健

美國朝野及西方國家紛紛指摘人民幣匯率偏低，多番向中國施壓，要中國負責任，調整人民幣政策；指中國害他們貿易赤字高企，人民失業，要求人民幣快速升值，究竟這種指責合理嗎？美國又為何急於要人民幣升值？

人民幣幣值影響中國人之生活，多於影響美國人之生活，中國政府應該按照國情去制定人民幣匯率，卻不能因為美國國情而損害中國利益。美國指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其實各國都有其匯率政策，這是各國政府都在做的事，而且還明目張膽。就如日本為防止日圓升值，就在外匯市場上大量拋售日圓；而美國本身亦有透過調整利率，影響美元價格。美國為何針對中國，這等同侵犯中國之主權。美國迫人民幣升值，相信有以下幾個原因：

轉移美國國內之視線

轉移美國國內之視線，把經濟不景與失業率高企之責任推到中國身上。金融風暴後，美國經濟沒有出現奧巴馬之 change，依然潦倒，樓價繼續下跌，失業率仍然高企，為避免國民將矛頭指向政府，便諉過中國，以人民幣匯率作為掩飾自身經濟問題之代罪羔羊。其實，中國輸美之產品於美國都屬停產之低檔貨品，怎會搶走美國人之工作；相反，匯價低還可以使美國人買到平價中國貨。

作為政治籌碼以換取利益

美國擺出之強硬姿態，目的是想以此作籌碼，向中國換取其他方面之利益。每有國際會議，美國就把人民幣搬出來炒作一番，甚至連同其他國家向中國施壓，在匯率問題糾纏不息，目的是迫使中國向美國讓利。

賴債，還少錢

匯率是相對的，人民幣不升值，假如美元自行貶值，人民幣連同其他貨幣也會相對美元升值，對美國未必有好處。中國作為美國最大之債權國，美元對人民幣貶值，才有賴帳之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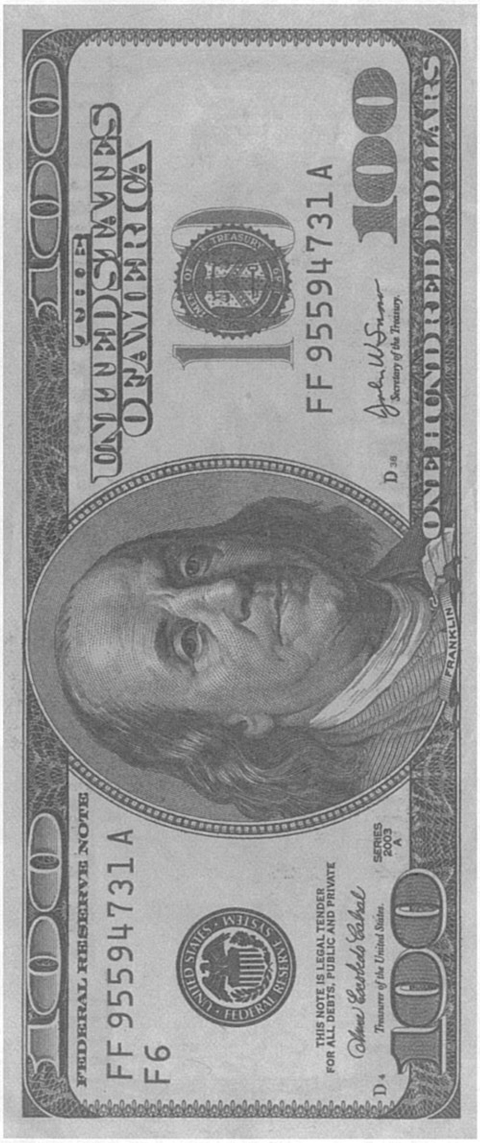
作為外匯儲備第一之國家，中國有外匯儲備超過二萬億美元，當中大部分是美國債券。其中不少是美元幣值高時，賣中國貨予外國換來的。如果人民幣升值使等同手上之美債貶值，以後就無法以同樣價錢買回當初可買到的，一大筆錢可以因此而不還。

累中國出亂子，無法崛起

日本之經驗顯示，出口國貨幣升值雖然不致於出口立即減少，卻足以形成泡沫經濟，有嚴重後遺症。從《廣場協議》來看，日本親眼目睹其經濟起飛後快速竄升之勢頭結束，逐漸演變為嚴重衰退，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又經歷貨幣快速貶值，從此一蹶不振，泡沫經濟破裂至今仍未恢復元氣。若中國成《廣場協議》之日本，美國之一哥地位便不怕崛起中國之挑戰。從溫家寶之言論，中國是不會如日本輕易受擺佈的。

一個國家之出口並不是全然取決於貨幣價值，更關鍵的是其生產能力及其貨品質素。生產出來的內需也不夠，又怎賣到外國去；質素參差的，外國消費者又怎會買完再買，出口國匯率再低也沒用。不解的是，買東西從來只有嫌貴，怎麼會嫌平。西方國家不是想買貴一點之中國貨，是他們欠中國的實在太多了，唯有設法賴帳，叫人民幣升值。而且，中國將無法轉型，實行不了現代發達國家之生產模式，繼續以廉價勞動力出口給西方，這是西方渴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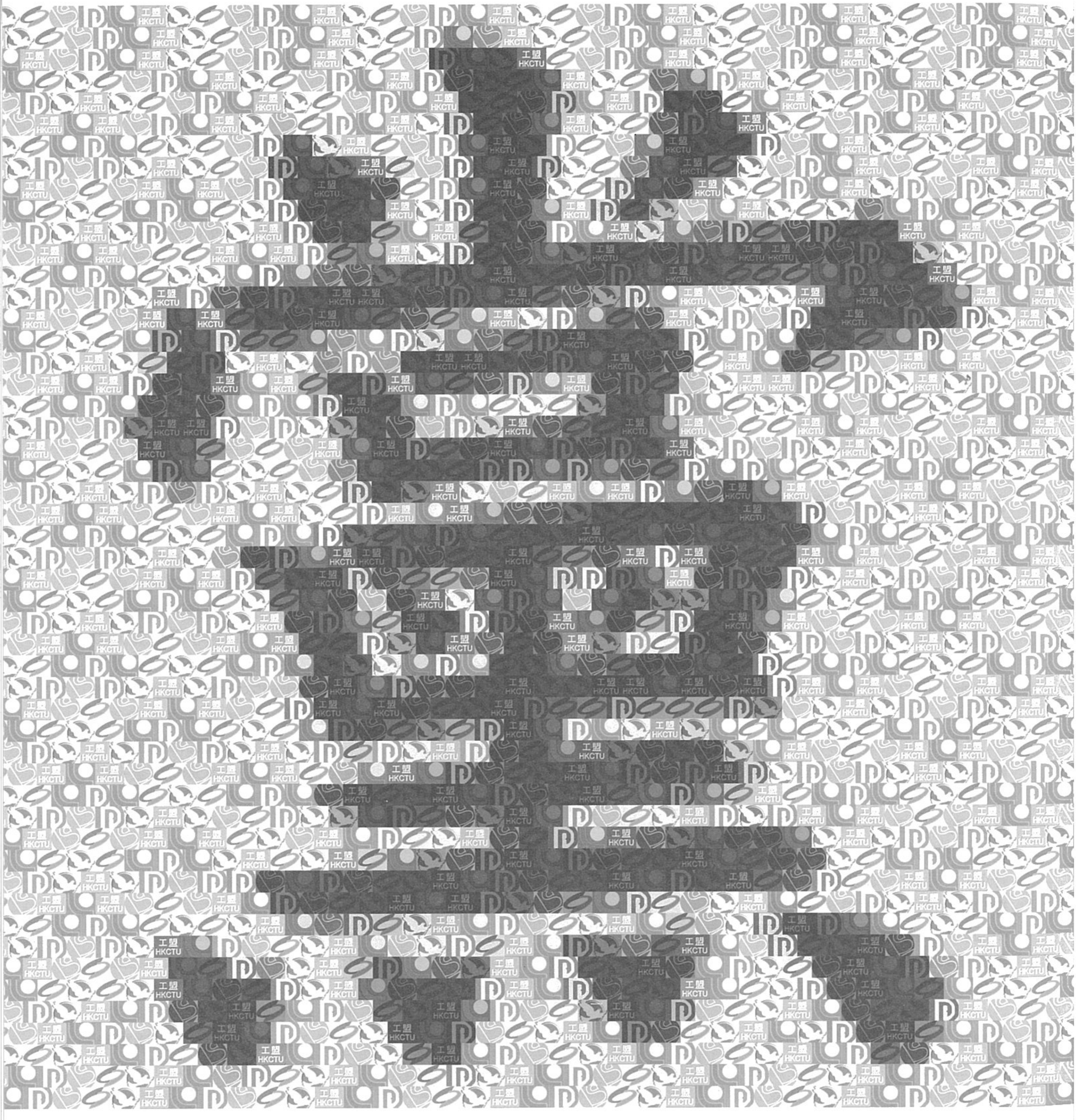


現時，中國之出口多是以美元定價的；如果以人民幣定價，人民幣升值，出口便可換取更多外匯，何樂而不為？但現時人民幣升值，收到之外匯貨款便不能支持以人民幣計算之工資與租金，中國廠商難以經營。美國便是藉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之地位，強中國之所難。

美國學者就此指出過，即使中國之產品因人民幣匯價上升而難再輸入美國，但仍有很多國家可填補中國之位置。美國消費者會轉買墨西哥之產品、越南、印尼之產品，一樣不會買美國之產品。結果是美國產業工人繼續失業，而消費者又被迫買價格比中國產品貴的，而品質卻較差的，生活反而差了。人民幣升值雖然減弱中國之出口能力，但會締造中國以內需去帶動經濟之環境，美國人就再難以買到價廉物美之中國貨。中國是生產商，美國是消費者，哪有消費者埋怨生產商供應之產品訂價過低。美國只要在嚇唬中國，並非真的想中國產品全面加價，否則美國人生活更難過。美國迫使日圓升值後，美日貿易盈餘依然有增無減，其實美國之問題是本身競爭力衰退，而不是別國之匯價偏低。

如果美元兑人民幣持續貶值，中國有理由拒絕買美國債券；每當人民幣被迫升值，就拋售一批美元債券，寧願將賺來之外匯來買黃金或原材料。現時中國還不斷增持美國債券，這樣只在帳面保住現有財富，但實際承擔風險更大。其實，中國手上之美元債券早已注定大部分收不回，成了死錢，中國不應再付代價去維護這筆死錢，不如拿一部分兇一下美國，要美嘗嘗人民幣升值可衍生出來之問題。美元崩盤雖有助賴債，但其副作用，卻可令美國經濟破產。中國擺出一副把外匯儲備撇帳之姿態，美國不會輕率對待中國之要求。

西方一向鼓吹自由市場、全球化，基本準則是自由定價和交易，你情我願之交易對雙方都有利的。中國願意廉價出售產品是中國之權利；產品是中國製造的，就有定價權。這是西方私有產權之基本原則。西方有權決定是否買中國貨，國會大可決議禁止中國貨入口，但國民又未必願意，便要中國按他們標準改匯價，這是侵犯中國之主權。只是，這個世界，還是由西方主導著，中國抗議，也不能夠太大聲，惟有鬥而不破。



從香港政治文化看本土政黨發展

外務秘書　曾安迪
學術秘書　劉子豐

所謂適者生存。人在甚麼環境中生活，就會有相應求存的行為。環境決定了人要怎樣做。以香港的政治生態為例，在如此崎型的情勢下，香港的政黨生態同樣地也十分崎型。有趣的是如此的政黨發展局面不單是本土生成的因素而致，卻與中國對港政策有著微妙關係，值得探討。

香港政黨生態現況綜觀

我所以把香港政黨生態形容為「崎型」，原因只有一個：他們不可能達成一個政黨定義上的目標一執政。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一在香港現存的政治制度下根本沒有政黨能執政。「反對派」無從執政，恒常持反政府立場，在議會上就政府施政起監察作用；「保皇黨」則於議會扮演支持政府的角色，平衡兩種聲音。由於雙方均無從執政，而政府施政各種程度上也受中央以及本地社會各階層人士影響，舉步維艱，反對派往往只能以批評反對，監察政府作政黨的目的，在崎型政治環境下批判制度，故有「站在道德高地」之說。如是者，議會功能上只起對政府的監察作用，而難有政黨相互制衡的作用。

如上述所言，香港政黨分兩大勢力，有兩個大黨、數個中型政黨，以及無數小型政黨。政黨以外也有少數論政團體及「智庫」。兩大勢力之一的建制派基本上有一套很完善的制度，由民建聯領頭，執行中央及政府指令，於議會上支持政策，民建聯外還有為數眾多的假「獨立團體」爭取游離選票，為政府政策「護航」。另一勢力一泛民主派則由各規模的民主派別組成。他們的組合主要由於一個大目標一爭取普選。香港的民主化直接影響他們執政的可能性，否則泛民主派只能是永遠的反對派。這個目標未能使他們政見上達成一致共識，故此各黨不如建制派之完善制度，策略的統籌整合協調皆稍遜一籌。他們缺乏一致方向及最高指揮領導者，在自由發展下，漸漸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各有定位。

泛民主派各黨形勢分析

民主黨：泛民主派中最大的政黨，卻沒有統領全派的能力（泛民主派策動的五區公投運動，民主黨拒絕參與其中），近年因缺少新的政治明星，被公民黨分了大量中產選票，被迫「民協化」，以地區工作為基礎爭取支持。

公民黨：一個新興政黨，創黨時聲稱要走英國保守黨式路線。以專業形象、明星效應及個別議題彌補缺乏地區根基的不足。

社民連：打著鮮明的福利社會主義旗幟，以激進衝擊建制的手段，爭取對社會現況不滿的選民的支持一在香港的社會結構下，社民連普遍就是較年輕的激進分子。

選舉制度對政黨政治發展的影響

一個地方的選舉制度對於決定政黨生態環境有關鍵性的作用。採用單議席的選舉制度（如美國），勝者全取議席，政黨政府較易走向兩極化；香港立法會採用多議席，比例代表制，這制度會形成多政黨局面一只要小型政黨或獨立人士得到一定票數便可取得一席，故有更大的生存空間。社民連就是一個例子一他們以激進行為爭取一定數量的選民支持，不必為大多數選民認同，仍可取得立法會議席。

未來政黨發展

假設泛民主派成功爭取香港民主進程，未來香港實現普選，而沿用比例代表制，政黨能夠執政，其發展將與如今大不相同。親中派會日漸式微，由於他們沒有一套確切的政治思想，難以取得選民支持；而泛民主派三大黨如無大變動的話將互相爭霸一公民黨右傾；社民連極左；民主黨中間偏左。雖然三者已有明顯定向，但即便較大機會執政的民主黨和公民黨皆未做好基礎理論工作，未有全套清晰的治港思維。香港未來發展如何，實是未知之數。

結語

在傳統政治光譜上，各個主要位置都有一個政黨佔據。香港的政治生態較為特殊，我認為到目前為止大多數主要政黨均未能完全定位，只有明確方向。在未有普選前，各政黨應把握時間做好管治思想上的工作，為未來執政做好準備。若以真普選在未來能實現的前提看，我對香港未來政黨政治發展有信心。

從「撐廣州話」看中國公民社會之蛻變及發展前景

市場秘書　陳倩文

今年七月，廣州逾萬人上街「撐廣州話」。

這次捍衛廣州話運動之導火線，始於廣州市政協提議於廣州電視台中頻道增加普通話節目播出時段。此提議一出，馬上掀起波瀾萬丈：除挑起廣州市民對嶺南文化被邊緣化的憂慮外，也激起他們對政府近年於市內大興土木、肆意拆遷的不滿。民眾由是挺身而出，浩浩蕩蕩的發起了這場「撐廣州話」運動。從此運動中可見，中國的公民社會正在以一個嶄新的方式蛻變；同時也可從中洞見中國公民社會之發展前景。

要邁進公民社會，必先有公民意識的基礎。可是自古以來，中國人的公民意識都相對薄弱。公民社會對中國人來說可謂是一個新穎的外來概念。根據亞里士多德所言，公民社會是指有平等自由的公民為了追求更美好生活通過平等締約方式建立的政治共同體。然而，在中國，這種通過平等締約方式而追求美好生活的意識是匱乏的。在過去千年的封建社會中，民是臣屬於君主的；民依從君的統治，從而換取美好的生活。民間一直欠缺一種以平等建基，組織民眾參與政治的意識。自步入現代社會開始，公民的概念冒起，不少民間組織誕生，但是民眾的公民意識仍然模糊，對於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並不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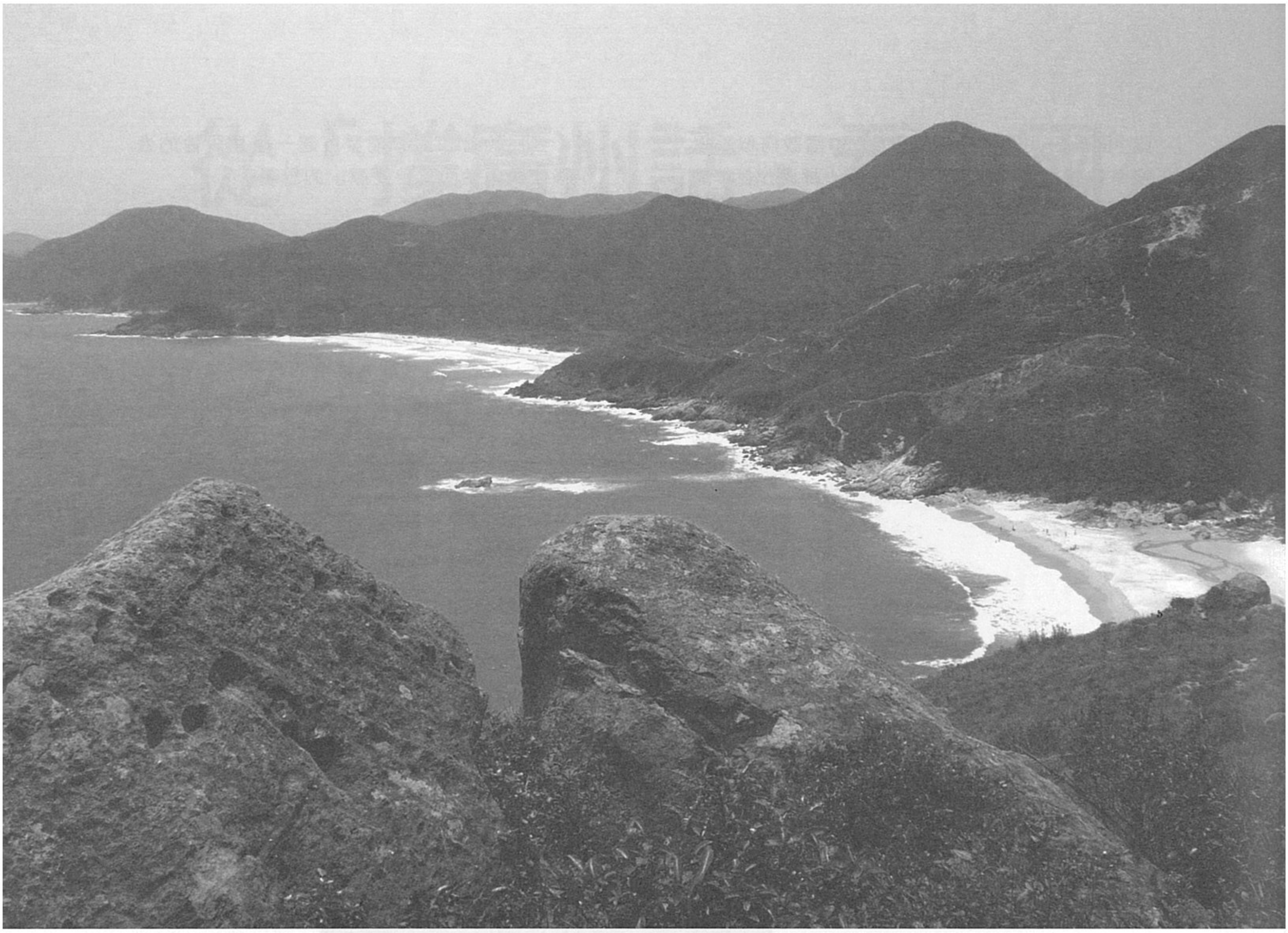
回看「撐廣州話」的運動，此運動恰恰反映了中國公民意識正趨向成熟。縱觀中共建國六十一年以來，大規模遊行之次數寥寥可數，當中不涉及個人利益之訴求的更是絕無僅有；而這次遊行整整是一個罕有的例外，是一場公民自主的，為公共事務、為保衛一種語言以致文化而發聲的運動。相對於近年中國發生的遊行，如番禺垃圾焚燒處理廠、廈門 PX 事件和拆遷等，「撐廣州話」的參與者並無直接的個人利益訴求。他們關注的已經不啻於個人利益，更多的是公共事務。民眾開始意識到：作為公民，他們有表達對施政不滿的自由，也有捍衛集體利益的權利。

在這次運動中，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民眾正在透過一種嶄新的方式展開公民運動－網絡。這次運動以微博作為召集民眾的途徑，並以互聯網作為議論平台。民眾在網絡上形成了一種自治的非政府虛擬組織，對社會現實問題加以討論及批判。透過公開地方發生的不義，並加以報導和進行討論，民眾最後得以左右國家決策。這重新界定了國家－社會關係。隨著互聯網的日漸普及，相信將加快公民社會的發展。

儘管如此，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仍有不少窒礙。其中，政府的思想可說是對公民社會發展最大圄

限。面於公民社會迅速的發展，中國政府似乎還沒有做好準備迎接它的到來。在「撐廣州話」運動中政府一如既往的打壓，表現了政府對公民參與政治此議題仍然是諱莫如深。遊行當日，當局派出上千公安圍堵和強行帶走民眾，更宣佈將今次網民「撐廣州話」活動定性為危害公共安全的非法集會。由此可見，民眾為表達對政府施政或公共事務不滿而作出的行動，對中國政府而言，是動搖統治的力量、是破壞國家和諧的洪水猛獸。要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必需先改變政府的思想。政府需打破「公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相互對立」這種思想，取而代之的，應該是一套「公民社會和國家能發展起一種建設性的合作夥伴關係從而實現雙贏」的思想。

展望未來，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道路未必平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隨著中國經濟和科技的高速發展，中國的民眾將會更意識到自由選擇、利益表達、政治參與、權利維護的重要，推使公民社會走向成熟。



反對郊野公園私有化 支持保育與發展平衡

主席　陳子聰

作為一個以金融、房地產掛帥的國際城市，香港其中一項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便是郊野公園。香港有二十四個郊野公園，佔全港約四成土地面積。這些土地都充當著香港人的「後花園」，也為香港帶來一項與其它國際城市不同的瑰寶。然而，繼沙羅洞事件及三號幹線興建的爭端為這些公共資源帶來威脅後，本年中「蒙能」主席魯連城在西貢大浪西灣私建私人樂園一事亦揭起連串香港保育政策的問題及環境保育與城市發展的衝突。編者認為公共休憩空間應受保護，尊重原有土地利用模式，故反對把郊野公園及其鄰近地區私有化，並應以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平衡保育與發展。

香港需要一個公共後花園

從大眾的觀點而言，香港人需要一個公共後花園。據 2001 年統計，香港前往郊野公園的遊人約 1,110 萬人次。除了郊遊、遠足等活動，香港的郊區更保持了香港的生態多樣性，如米埔拉姆撒耳濕地、海下灣海岸公園等具生態價值地區，正正為了各種動植物提供棲息的地方。就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而言，一個公共後花園更為香港大大補充了經濟以外的不足，即社區（限制原有郊區發展）及環境（生態穩定）的可持續發展。因政府過去大力限制發展區面積，故儘管經歷百年發展，從衛星映象可見，

香港大部份土地仍是綠油油的林木；反觀一河之隔的深圳，經歷過去三十年的急速經濟發展，加上政府政策誘使工廠每五年遷址一次，深圳市大部份土地均為已發展區。香港實在以深圳之例子為借鏡，好好珍惜現時香港所擁有的郊野公園資源。

反對公共資產私有化

郊野公園屬大眾的休憩空間，不應由個別富商藉其財力在郊野公園進行「割據」。大浪西灣是位於西貢區內一著名郊遊點，被譽為「香港最後一個天堂」。「蒙能」主席魯連城年中向西灣村村長購下土地，並進行土地平整工程，移除原有植被，並挖掘了兩個人工湖。由於地盤牽涉未經申請而擅自佔用約 5000 平方米官地，工程引起的污染更會污染該處生態環境，破壞原有自然景觀，更引起社會關注政府對郊區保育的政策。撇除其非法佔用的官地範圍，魯連城本打算在大浪西灣建造一個有高爾夫球場等設施的私人樂園，但其土地既非郊野公園劃定範圍，又未被納入分區發展圖則，更沒有劃定土地用途，故漁護署、規劃署、環保署等部門均不能干涉其工程，政府對此顯得束手無策。只是在巨大輿論壓力下，為免被冠上「為富不仁」之名，魯連城才不霸王硬上弓，暫停計劃。同時，政府才急急把連同大浪西灣在內的三個地方撥入發展審批藍圖，限制其更改土地利用。政府實在不應在環境保育事宜上採取被動角色，並應確保郊野公園不會被其旁邊的私人土地破壞。

反對地產霸權，避免加劇仇富情緒

大浪西灣的個案反映的是香港富商的權勢之大。香港樓市炒賣之風正盛，全港最少十間公司已從郊野公園的村民手上買入土地，這些土地隨時有被發展成住宅樓宇的危機。村民知識水平一般偏低，容易被財雄勢大的地產商欺騙而賣出土地。如西灣村村長黎恩表示，賣地時發展商表明會翻新舊屋亦不會建新屋，也不會對土地原貌作大改動。當他目睹兩個人工水池，也大感不惑。其它關心郊區發展的市民，甚至環保團體，也難與發展商「抗爭」。「先破壞，後建設」的個案常見於郊野公園的土地發展，如政府曾經批准一非法鋪泥的地盤興建丁屋，變相鼓勵發展商犯險，違法破壞自然環境；海下灣亦被揭發有日本發展商打算沿海興建豪宅而可能因填海而對海下灣造成嚴重污染。地產霸權所引致的貧富懸殊、平民百姓「一樓難求」已使香港形成深刻的仇富情緒，如此等情況入侵郊區，勢必進一步加劇此社會矛盾。此外，香港實在不應過於依賴樓市炒賣支撐經濟，珍惜自然資源，亦可大力刺激旅遊業的發展，使香港經濟更多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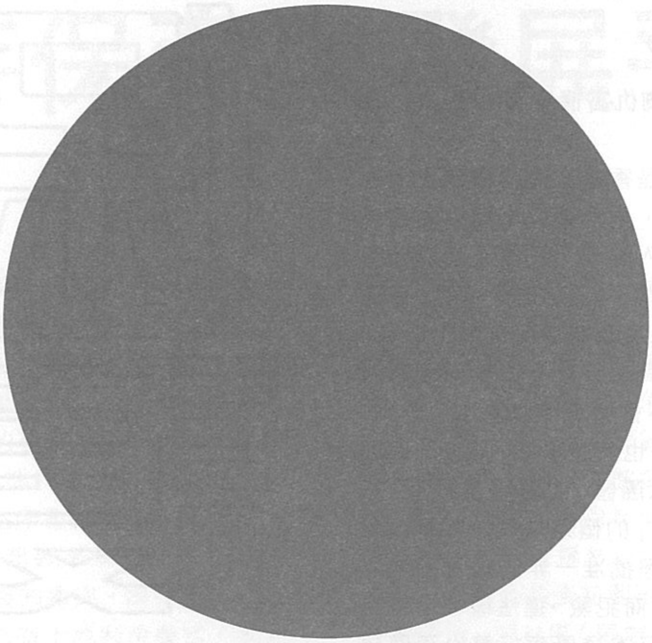
要求政府謹慎施政，平衡發展與保育

政府在社會巨大輿論壓力下，宣布凍結大浪西灣、白腊和海下灣的發展三年。這政策雖然能在短期內確保自然生態免被破壞，卻無助長遠郊區的可持續發展。尤其對郊野公園範圍內的原居民，更有「掠奪私人土地」之嫌。他們成了環境保育下的犧牲者，使他們未能從出售土地中獲取其應有利潤，政府更未有補償其損失。另外，除了對私人用地的管制，政府亦應好好計劃官地的發展。如政府計劃在大埔龍尾灘鋪上人造沙以提供更多泳灘，卻忽略了龍尾灘漸高的生態價值，使民間主動發起「救救龍尾」行動。因此，希望政府施政能謹慎，以民為本，避免過度重視發展而忽略保育。否則，民間組織可考慮參考英國和台灣成立信託基金，購買具生態價值的珍貴土地，加以保育，以保政府的不足。但保育畢竟關乎全港市民，政府實在責無旁貸。

保護西灣

保釣運動

外務秘書　曾安迪



近日，中國與日本就釣魚島主權在外交場上鬧得火紅火熱。一時又經濟制裁，一時又傳出妥協消息，甚至連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也提出召開三國峰會，希望解決這場外交風波。究竟一個小小的釣魚島為甚麼會引起這麼大的迴響呢?

早於光緒年間，中國於甲午戰爭戰敗，被迫將台灣及周邊的島嶼劃予日本。到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後，各國之間簽署的各種文件都指出台灣及附近島嶼都屬中國所有。可是，日本卻將釣魚群島的管轄權交予美國，而美國又在 70 年代把該群島「送給」日本，造成了今日的困局。

根據國際關係理論之現實主義（Realism），每一個國家都是為自己利益而行動的理性行為者，並且具有侵略性。國家的主要目標是自身安全和存續，集結軍力和資源正是達到目標的手段。日本是一個缺乏土地和資源的島國，面對有幅員遼闊、人口和資源均盛的中國，存有危機感是正常不過的。

自一九七一年釣魚島被發現藏有大量天然資源後，一直對有關問題採取不聞不問態度的中共及民國開始宣示主權及向日本抗議。根據現實主義，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由彼此的軍事及經濟力量判定的。改革開放前，中國在外交場上一向積弱。直至二零零四年，中國才首次在外國手上拿回因簽署不平等條約而喪失的領土一黑瞎子島。現時，中國軍力不斷擴張，經濟上亦剛剛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以，中國政府今年一改以往對外國處處忍讓的作風，變得強硬起來。

社會構成論（Social Construction）指出，政府的決定是受該社會的文化及共識所影響。從這個角度看，中日邊境關係相對於中俄及中朝等緊張關係，是基於歷史和文化因素的。中日自明代以來便一直處於對立狀態。二戰後，中國人更對日本恨之入骨。自中國船長被日本政府扣押後，中國內地處處有示威，中國政府甚至對日本作出經濟制裁。不少國際關係學者都認為中國政府反應過激。其實，這些都可能是基於中日之間的心結。

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論從經濟、主權還是文化角度出發，都理應支持保釣行動。作為一個社科人，我們則應該分析並理解中、日政府的行為及其背後的用意。保釣這件事始終是各執一詞的。對於日本政府的行為，我們應先放下中國人的身份才可以展開學術上的分析。始終，日本是有先天上及條件上的局限，才引致他們有過去百多年的侵略性行為。

作為港大社科人，放下理性的學術分析後，便要肩負起我們的社會責任。我們一直是社會運動的先鋒。我一直相信讀社會科學就有以知識及行動改變社會的責任。請大家在心中緊記我們的一位師兄一陳毓祥。他是一位七十年代讀社會科學的師兄，香港大學學生會的主席。他一直努力用自己的一分一力改變社會。反葛柏，他是領導者。對於保釣，他是第一個捐驅的人。希望大家以他為榜樣，用盡自己的力量使社會變得更美好。

給六四亡靈的和平獎

外務副主席　楊子俊

劉曉波：「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説完就哭了。

10 月 8 日，諾貝爾評審委員會以「在中國為基本人權持久以非暴力的奮鬥」為由，向劉曉波頒發諾貝爾和平獎。另邊廂，中國政府聲稱劉曉波獲獎是「褻瀆」了諾貝爾和平獎，違背該獎的宗旨。

劉曉波生於吉林長春，原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因參與六四事件被開除職務。事後，劉曉波拒絕出國，不斷以文字抨擊時政、爭取人權，並於 2008 年發起《零八憲章》，呼籲政府尊重言論自由、人權和自由選舉。2009 年末，北京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劉曉波有期徒刑 11 年。

劉曉波獲獎引起了香港傳媒的廣泛報導，民間要求中央政府釋放劉曉波的聲音亦再次熾熱起來。市民大都表示支持劉曉波獲獎，贊同他以和平方式爭取中國人權的努力。事實上，從劉曉波身上更能看出六四的延續。

「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

八九民運當年，劉曉波早在 4 月已到天安門聲援學生，後更絕食 72 小時呼籲學生和政府重新開展和平對話，是「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劉曉波等亦命令學生砸毀槍械，堅持非暴力原則。六四清場前，他又呼籲學生撤退，以免造成更多死傷。

在整個六四事件中，劉曉波始終保持理性，和平地向北京當局表達人民的意願。中央最後採用武力鎮壓異見固然是不可原諒，但我們也不能否認部份民眾襲擊軍隊的激進行為是加強了當局訴諸武力的決心。政府和人民不就是缺乏劉曉波一直堅持的和平精神，才導致八九民運最後是充滿槍聲和血跡的嗎？

六四後，劉曉波拒絕出國，繼續為六四死難者爭取當天未能達到的政治民主化。雖然多次被拘留、自己和妻子長期受到監視，但劉曉波始終沒有放棄。如果説那些現於外國擔任公司總裁、叱吒金融界的學生領袖們是在「傳播革命火種」的話，劉曉波和一眾冒險聯署《零八憲章》的國內民運份子就是在「傳遞革命火炬」，真正承繼了六四抗爭的精神。

六四與和平

港人一直要求「平反六四」，勢言要為當年的死難者「雪冤」，因此每年都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高呼口號」和「悼念」。其實，六四烈士在天之靈，最希望看到的是甚麼？

諾貝爾評審委員會頒發和平獎給劉曉波，劉曉波則認為這個獎應屬六四亡靈。現節錄委員會的新聞稿，一窺究竟：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一直堅信，人權與和平，二者休戚相關，密不可分。在過去數十年間，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現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數以億計的中國民眾由此擺脱了貧困。中國與日俱增的國際地位，必須伴隨著與時俱進的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明確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而實踐層面上，事實證明，這些中國公民本應享受的自由無疑地被剝奪了。

二十年以來，劉曉波一直是基本人權在中國實踐的代言人。他曾參加了 1989 年的天安門抗議；他是作為中國人權宣言的《零八憲章》的執筆人。此項旨在確立普世人權的中國實踐的運動，得到了海內外眾多中國人的支持與響應。縱然身陷刑罰，劉曉波已經成為了方興未艾的中國人權奮鬥的標誌與豐碑。」

一個專權封閉的政府，永遠不會大方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只會反稱異見是褻瀆和平。一個真正屬於人民的政府，才會以人民的意願作依歸。追求和平、平反六四之正途，實是有跡可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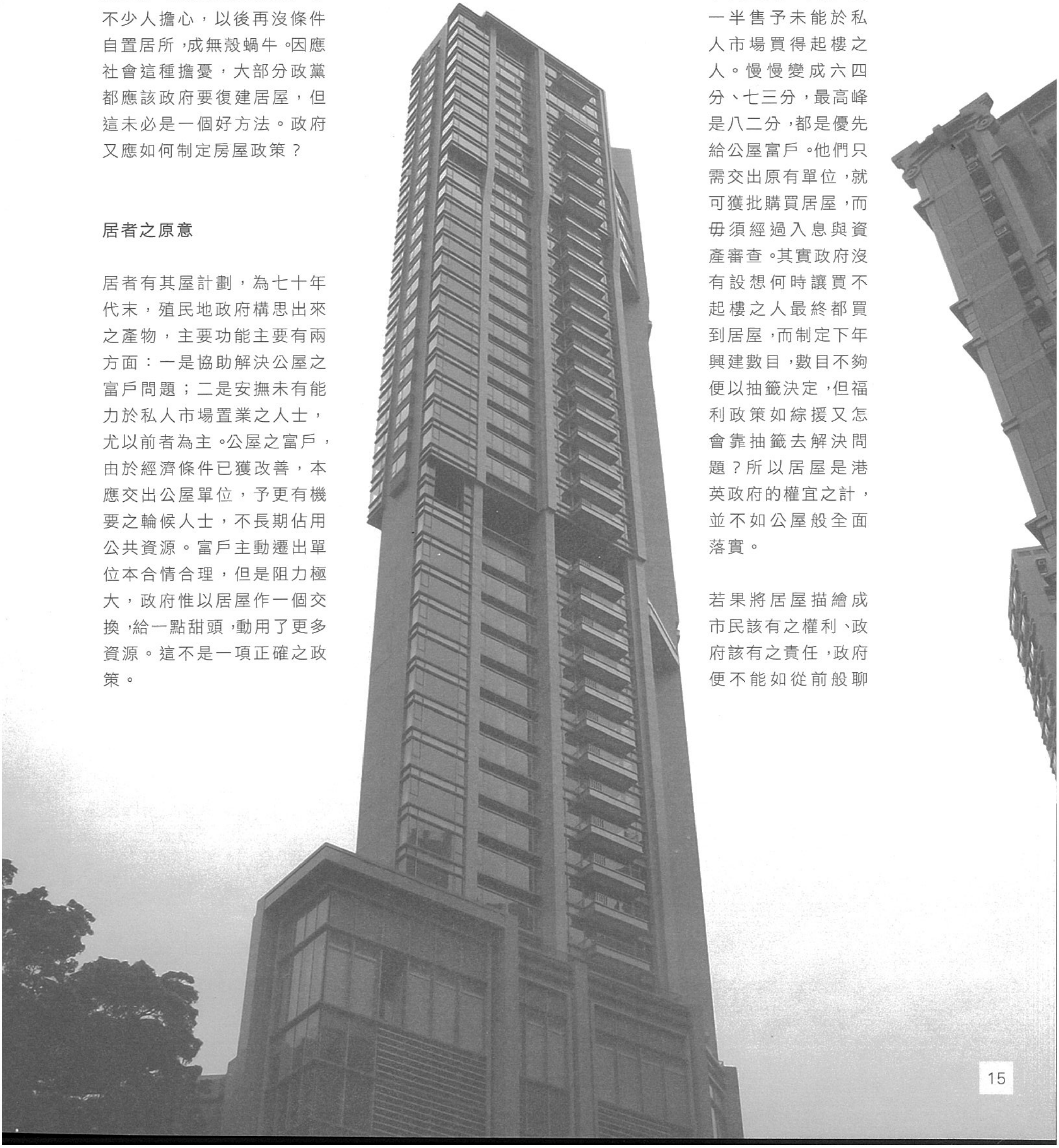
政府應如何調較樓價？

時事秘書　鄒偉健

金融風暴後，香港樓價只往下調整不足半年，又旋即調頭上升，且脫離市民負擔，令不少人擔心，以後再沒條件自置居所，成無殼蝸牛。因應社會這種擔憂，大部分政黨都應該政府要復建居屋，但這未必是一個好方法。政府又應如何制定房屋政策？

居者之原意

居者有其屋計劃，為七十年代末，殖民地政府構思出來之產物，主要功能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協助解決公屋之富戶問題；二是安撫未有能力於私人市場置業之人士，尤以前者為主。公屋之富戶，由於經濟條件已獲改善，本應交出公屋單位，予更有機要之輪候人士，不長期佔用公共資源。富戶主動遷出單位本合情合理，但是阻力極大，政府惟以居屋作一個交換，給一點甜頭，動用了更多資源。這不是一項正確之政策。



居屋最初推出時是五五分配，一半配售予公屋住戶申請，另一半售予未能於私人市場買得起樓之人。慢慢變成六四分、七三分，最高峰是八二分，都是優先給公屋富戶。他們只需交出原有單位，就可獲批購買居屋，而毋須經過入息與資產審查。其實政府沒有設想何時讓買不起樓之人最終都買到居屋，而制定下年興建數目，數目不夠便以抽籤決定，但福利政策如綜援又怎會靠抽籤去解決問題？所以居屋是港英政府的權宜之計，並不如公屋般全面落實。

若果將居屋描繪成市民該有之權利、政府該有之責任，政府便不能如從前般聊

備一格，而要真正動用社會資源加以落實；輿論不斷改善居屋質素，之前已出現過之夾屋，將來可以有更高級之夾屋；如此發展下去，置業花費龐大，擠走其他福利政策之資源，將影響社會基層生活保障。

居屋能否遏抑樓價

部分人以居屋遏抑樓價為由，鼓吹復建居屋。究竟居屋能否遏抑樓價？其實居屋在這方面起之作用不大，因為房委會在居屋興建上甚有節制，沒以遏抑樓價為興建之目的。

居屋由政府透過房委會興建，但政府卻沒有自行定價去影響私人市場。相反，房委會是跟隨私人市場之價格波動而去為居屋定價，變相是給買家一種折扣。因此，這是水漲船高，居屋價格跟隨私人樓價高而高，而私人樓價不會因居屋訂價低而水退船低，居屋在這機制下對私樓難起調節作用。

再者，地產商可能會因應居屋入息上限而重新定位，將符合申請居屋資格的交給房委會照顧，而集中去照顧收入較高之一群。銷售對象不包括較低收入之人士，這樣就不會將貨就客，興建小而訂價不高之單位，因為居屋將提供這類單位。發展商可能就興建更多「豪宅」，更高檔次，收窄了私人市場之範圍，而買家都是高收入人士，樓價更易上升。另外，房委會定居屋之售價時，只參照由高收入人士組成之私人市場，所以即使打了個折頭予居屋買家，也不便宜；如果業主補地價的話，等如折扣也沒打。房委會不為出售居屋作補貼，利潤等同私人發展商。

殖民政府明白居屋只能小量供應，不能令中產階層都不買私樓，改為政府照顧；私人市場價錢升不起，居屋也難賣得好。如果樓價跌至建居屋也要政府補貼，建公屋之能力也會受影響。

居屋非民生基本需要

住屋是民主之基本需要，政府制定政策時，不能不考慮市民這方面之需要。當然，大多數人除了希望有樓住外，還希望成為業主，擁有資產，又可以於經濟增長時，資產價格上升而分一杯羹。但這需求非單純之住屋需求，而是滲入了投資成份，這不是政府之責任。

解決基本需要後，有額外積蓄才可量力而為去投資。買居屋也是一種投資，是有一定風險的。房委會可以減收公屋租戶租金，但買居屋是向銀行借貸的，若供樓出現問題，損失慘重。一個需要社會資助之人，就未必應該去投資。

樓價跌之時候，居屋無人問津，樓價升時，居屋申請者又增加。要居屋不涉及投資成分，其訂價就不應與私人市場掛鈎，房委會以發展成本賣樓，以重置成本收回。但這樣居屋購買者便失去意欲，房委會也失去發展利潤，資源不足以又建公屋又建居屋。居民理念混淆，不易制訂統一政策。

主動賣地　勾地多餘

早前何文田豪宅用地成功賣出，且價格遠勝遠期，勾地政策看來已經過時，政府毋須死抱不放。何文田這塊地未獲地產商出價勾出，只是民間要求增加土地供應之呼聲大增，政府才破例主動拍賣土地。地產商並不會因為土地不是他們勾出就不出來捧場，當市場有需求時，他們又怎會放棄賺錢機會。

勾地政策是八萬五之後遺症，當年新盤銷售困難，貨尾愈積愈多，政府怕主動賣地無人問津，或只以低價成交，令樓市雪上加霜；賣地成績不好，將拖累樓價，令更多人成負資產，政府進一步收縮信貸，經濟便難翻身。

勾地之地產商需先付一定之誠意金，還得於拍賣時出價至原先承諾之價錢，有風險卻無好處；不去勾地的卻也有權參與拍賣，無需成本，因此地產商對勾地不積極，致賣地愈來愈少，樓宇供應不足，樓價節節上升。

今次之嘗試，説明主動賣地未必對樓市有負面影響，政府應乘機修訂政策，不再純以勾地提供土地，起碼可以雙管齊下：一方面將原有勾地表保留，另方面按社會需要主動推出土地拍賣。政府可以從勾地表挑選，亦可以推出勾地表以外之土地，這樣地產商就不會囤積居奇。

勾地之好處是不怕無人承接，但壞處是地產商只考慮盈利需要，而不是社會之整體利益。然而，何時何價賣地、賣何處地，涉及民主、宏觀經濟、政府財政及城市規劃之需要，這些是政府之責任，不應放棄承擔而把工作交予地產商。

市民安居　政府有責

以香港經濟發展水平，香港人有條件住得比現時好，但香港人卻連安居問題都未解決。香港之人均居住面積，比同等經濟發展之地區都要低，因為我們買樓的錢主要支付地價，不是建築費。若果政府土地供應充足，樓價中之地價比例就會降低，以港人賺錢能力，付錢去建造千餘尺之單位並不難。

所以，有好的房屋政策與城市規劃，未必就一定要建居屋。居屋只是將昂貴之私人樓價打個折出售，但若然政府有足夠樓宇供應，私人樓價也可以下跌。當然，一次增加太多之土地供應亦會有後遺症，還記得八萬五，香港已有超過一半家庭擁有自置居所，資產一下子大幅蒸發，失去消費與投資能力，會釀成通縮與經濟衰退。因此，政府在增加土地供應時應配合宏觀經濟形勢，令樓價雖有得升，升幅亦不會大於經濟增長，令現時相對偏高之樓價逐步合理化。

政府不應以調節市場不容易為由而推搪，因為香港土地供應主要由政府控制，怎能將調節樓價之責任全然交予地產商。近年土地供應明顯不足，去年落成量就只有八千個單位，為正常之三分一，樓價怎能不升？現時炒家有機可乘，是因為政府政策不夠清晰；若炒家見到政府立定決心，於下階段增加土地供應至樓價下滑，炒家會有所收斂。只要特區政府肯有節制地增加土地供應，香港人就有條件逐步改善居住環境，居者有其屋。

沒折扣之居屋

現時，熱錢源源湧入，市場被扭曲，香港人擔心市場上多了一批內地買家而受到威脅，其實政府在推出土地時可有一條文，規定只賣給永久性居民，以保障中產階層置業機會，不被外來資金奪去。如新型居屋，這並不等如排斥外來投資。

香港之住屋問題可分三個層面去解決。收入最低之基層，可以住政府提供之公屋；入息超過申請公屋上限，競爭能力又不及外來投資者之中層，政府可提供有特定銷售對象之土地；至於最高收入階層，提供之土地可同時開放予外來投資者去競爭。第二類土地可直接批給私人發展商，不必經過房委會，政府甚至不用規定打折扣優惠給買家；只需調節供應，令這類居屋之售價處於買家可承擔水平。政府更可加上一些限制，例如只建八百呎以下之單位、只能自住不能出租等。限制愈簡單愈好，這樣可以用市場機制去落實，避免政府行政干預，減少舊居屋政策福利與投資並存之矛盾。

這既可以人人有份，不失其公平性，又可保障物業落在本地用家中，不自住就沒有效益，減少用家市場被投資因素所扭曲。

世博—國際盛事還是國家盛事？

主席　陳子聰

史上規模最大的世界博覽會剛在神州大地上最耀眼的東方明珠上拉下了帷幕。其進行期間的和平順利、數百億元進帳、七千二百萬入場人次，都為是次世博會鑿上「成功」二字。然而，要認真為中國繼奧運以後的一場「國際盛事」結算，可不能光看表面數字。當外國普遍把世博當作「中國的盛事」時，世博有真正把中國帶向世界嗎？或是說，中國有能力把世博帶向世界嗎？透過筆者早前親訪世博的經歷，或可略說一二。

不出門而知天下

在這場匯聚了超過二百個國家及組織的國際盛事，遊客放眼四周都是興奮莫名的同胞們在左拍右拍。在世博遊歷的兩天，除了工作人員以外真的看不見多少外國遊客。為何一場世界盛事是要讓中國人「不出門而知天下」？其實，這場「國際盛事」就是世界各國一起做場好戲給中國人看。遇上為乘涼而讓兒子穿開襠褲的遊人、排隊也要作好「防守」以應付層出不窮的打尖方式，還有多少外國遊客敢來訪？國人在世博看到世界共融(展館工作人員)、綠色環保(無線新聞所指運作不到的高科技垃圾筒始乎更消失了)、祖國展館的高聳偉大、創下五個第一、超過五百個印章可以敲，祖國何其強盛偉大！連部份告示塊都乾脆只用中文了。花了四百多億美元娛樂國民，中國的「國際盛事」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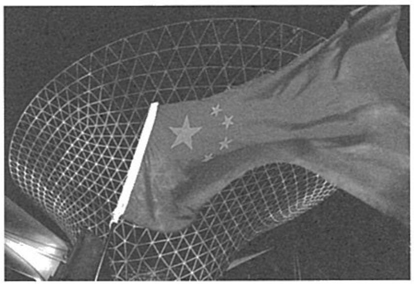
應酬，讓關係更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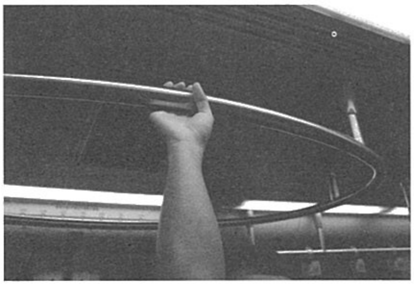
連繫二百多個國家及組織的，就只是一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五個主題館精彩地演繹了城市的精髓，以探索城市發展方向及城市與人之深層關係為題的智利館也緊緊呼應了大會主題。然而，其它大部份展館又如何？強國崛起，要辦盛事自然一呼百應。但只要細看一下，佔地龐大的法國館原來是個空心建築，只放幾件中國人看不懂的藝術品；美國館更索性甚麼展品也不放，就放三場大熒幕電影，唯一的「展覽區」就是其贊助商的廣告；非洲聯合館、柬埔寨館等「資源貧乏」，拿不出甚麼好展品招呼大家。不要緊！她們有各式民族衣飾、小食販賣，甚至要購物才能敲章，多親切！感謝各國的熱烈協助，改善了中國跟世界的關係，上海更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都會」！城市，果真讓生活更美好。

敲章的背後

以城市為主題的一次世博會，「城市主題館」相信是最精彩的展館之一。不論展館體積、觀感、設計意念、傳遞媒介、訊息剪裁等等都勝過很多國家館，透過多角度的內容扣緊主題，反思城市如何避免成為地上毒瘤而造福人類。可是，捧場者寥寥可數。原來，遊人都偏好各個國家館，清楚一點是偏好各個國家館的印章。數之不盡的遊人進場後就掠過所有展覽內

容，長驅直進至敲章處。看來，取得最多的國家印章是他們遊世博最重要的目的。也許我們（包括讀著此文的你）都會為世博變成「印章嘉年華」而慨歎，但再想一想，這些來自內地各省各市的遊客，連出席公





眾場合的禮儀也未必知道，又有多少人能明白「可持續發展」、國際環境問題、城市未來發展等議題？對大部份未出國遊歷過的他們，能在國內「環遊世界」也許才是最大的得著。

見微知著

世博也真的有值得表揚之處。誠言，主辦單位其實挺細心。遊客在世博園區內逗留最久的是等候區，動軛站個數小時。然而，幾乎全部等候區都有上蓋，更有風扇及灑水系統，定期灑下幼細的「雨粉」。雖然這對正在閱書的遊客或會造成少許煩惱，卻肯定冷卻了許多遊人在盛夏的燥意。至於地鐵，每對車門間的扶手頂部都設計成一個圓形，方便擠擁的遊人乘車時找到「依靠」。外國的地鐵扶手也有類似設計，可見主辦單位的用心。這些簡單便宜的設計，卻大大方便了用家。關鍵在於營運者真的用心對待用家，還是只懂對大家說「唔好意思」。

盛事尚未國際化

說上海世博會成功了，是因為中國在這次充滿政治意味、只許成不許敗的世界盛事中，選取了在現實情況下最得宜的策略一動員自己強大的人民基礎，使之熱熱鬧鬧、風風光光地完成了。相比亂子不斷的印度英聯邦運動會，世博又成功展現了中國和上海的大國、大城市風範。然而，要出動大批國民，「副產品」就是他們的教育程度不均、城鄉差異等問題都一一現形。從實際遊客來源、展館質素、籌備背景而言，與其說這是個世界博覽會，不如說這是世界為中國人而辦的嘉年華、中國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博覽會。盛事過後，寄望中共把目光回歸國內，縮窄國內貧富懸殊、提升人民素質、改善鄉村教育，使中國真正跟世界接軌，在不久的將來舉辦可招呼世界各地遊客的「國際盛事」。

《鳴放》編輯組

總編輯
外務秘書　　曾安迪

編輯
主席　　陳子聰
外務副主席　　楊子俊
市場秘書　　陳倩文
時事秘書　　鄒偉健
學術秘書　　劉子豐

設計／排版
外務副主席　　楊子俊

校對
常務秘書　　廖珮盈

二零一零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會房地址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梁銶琚樓 LG111 室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10:30 a.m. - 6:30 p.m.（假期除外）

電話及傳真
2540 3757

電郵
ssshkusu@hkusua.hku.hk

網頁
http://www.hku.hk/ssshkusu

Facebook
Facebook 上搜尋「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KUSU」

撤回政改方案
on.cc
明知兵行險著...明知以卵擊石...
總動
當假普選殺到埋身 我們必須義無反顧
不要小圈子政治
公投議題: 盡快實現真普選 廢除功能組別
5區公投 全民起義!
真普選
拯救大浪西灣!
不容緩!
請支持我們，也為自己的家園出一分力!
民主黨
民主—我们共同的理想
ДЕМОКРАТИЯ—НАША ОБЩАЯ МЕЧТА
consum28
六四 薪火相傳
六四 堅持到底
Pass on the Flame
支持
政制改革
起錨
萬人上街撐廣州話
城大副學士
不獲承認
六.四
永垂
不朽
曾俊華
財政司司長

港大社科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KUSU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